

doi: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8.06.00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将到来之时,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是希望将中国发展的理论与经验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 新结构经济学; 一带一路; 改革开放; 比较优势; 发展援助; 基础设施建设; 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072(2018)06-0005-05

一、改革开放40年回顾

本文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角度谈“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 回顾这40年, 中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时, 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 当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 被称为黑非洲的地方。1978年时, 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是490美元, 中国当时连它们的1/3都没有达到。跟世界上其他贫穷的国家一样, 当时81%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 84%的人生活在一天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以下。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 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4.1%, 进口占5.6%。也就是说, 90%的生产活动无法跟国际接轨, 并且在出口的产品当中, 75%以上是农产品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品。

但是, 就在这么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 在改革开放过去的这40年里, 中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率,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 曾经有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迅猛, 达到平均每年14.5%的增速。

在这么一个快速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中, 2009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按市场汇率计算超过日本, 变成世界第二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超过德国, 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而且95%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 所以现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以后, 最早的世界工厂是英国;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 世界工厂是美国; 二战以后, 世界工厂是德国、日本; 现在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在2013年的时候, 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而且贸易进口加出口, 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从1978年的9.7%, 到现在达到35%左右。在人

^{*} 编者按: 本文系林毅夫教授于2018年9月2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本刊责编对全文稍作修改后, 由林毅夫教授审定。

口规模超过1亿以上的大国中，中国现在是贸易占经济GDP比重最高的国家。2014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在这段时间里面，有超过7亿人摆脱国际上日均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线。世界上有很多国际发展机构，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开发总署，还有各个地区性的开发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等，它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但是回顾这三四十年的时间，如果把中国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去掉，世界贫困人口却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以及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绝大多数却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或危机不断。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中国一直在稳定而快速地发展。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所以经济增长一旦放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就此起彼伏。但是回顾起来，中国却是过去这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为什么能这样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来推动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一些西方理论来进行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以渐进式及双轨制的方式推行的，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很多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它们效率低，基本上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当时推行的政策实事求是，对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转型保护和补贴以维持稳定。对那些传统上受抑制，但又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而且积极地因势利导，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通过招商引资，把比较优势迅速变成竞争优势。因而，这些新的产业发展得非常快，积累了资本，使得比较优势在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中也不断得到提升，使旧的产业从违反比较优势逐渐成为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拥有自生能力，为取消保护补贴和政府干预创造了必要条件，改革随之不断深化。这是中国在过去这40年中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沿着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道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去推进，国际上有很多机构，国内也有很多学者预测，到2025年前后，我国可以跨过GDP人均127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二、国际发展援助的反思

中国是拥有辉煌文明的古国，自从鸦片战争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以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正如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纪念会上所讲的，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民富了、国家强了，中华文化还倡导“己利利人、己达人”。中国希望自己国家富强，也希望其他跟中国有着同样历史、同样命运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像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一样，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摆脱贫困，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成立了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总署等多边国际发展机构,美国自己也设立了美国国际援助总署,英国、法国、德国等也有这样的机构。而且,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钱不少,超过3万亿美元。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200个左右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到现在只有2个从低收入水平进入到高收入水平,到2025年左右,中国将是第三个。在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只有13个经济体发展成高收入,其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虽经过两代多,接近三代人的努力,还陷于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水平,没有办法从低收入跨进中等收入,或是从中等收入跨进高收入的水平。所以,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发展援助责任的时候,应该总结发达国家发展援助未能真正帮助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采取一种更有效的办法。

笔者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去之前,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国家天下的情怀,总觉得民族的复兴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到世界银行工作以后,跑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现,其实此心相通,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是他们国家民族中幸运的一群,对他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负有责任,也希望他们国家富强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政治领导人的追求也是一样,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然而,虽有自己努力,又有那么多国际机构提供援助,为什么成功的国家却那么少呢?

从世行回来以后,笔者一直在大力倡导一个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给的发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钢并没有用到刀刃上。

三、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下 国际发展援助新框架

经济发展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其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依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随着现代技术的使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大,电力、通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这样的进程,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瓶颈限制是什么呢?大家出国走一趟,就算不是经济学家也能看出来,那就是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就没有办法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发展现代化的产业去提高生产力。国际上的发展援助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改善政治治理、增加政治透明、提高人权、促进男女平等、发展教育和医疗等方面。这些发展援助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并不能真正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我国的发展经验知道,要致富先修路,必须将基础设施完善了以后,一个发展中国家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这就是为何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新的由中国倡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时,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来推

动的主要原因。

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援助合作的框架提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从两项指标来看：第一，我国作为援助国会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所需资金规模非常巨大，必须用多边的方式来动员市场的资金，因而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备的时候，美国公然反对，给很多国家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参加。但是这样一个机构是符合各国发展需要的，所以得到积极热烈的响应，有57个创始会员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到现在已经有77个成员国，而且还有几十个国家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截至目前已经是除世界银行外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第二，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了29位国家领导人，有160个国家和国际机构代表团来参加，是2017年国际上最大的盛会，这表明中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仅中国看到了，其实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看到了。201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倡导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把中亚五国与阿富汗连在一起，在印度洋找到一个出海口。同年，美国还提出“印太经济走廊”构想，用基础设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这些倡议的内容和“一带一路”倡议是相似的，但是现在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印太经济走廊”构想，在国际上已经无声无影，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得到了积极反响。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这是因为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而且是可信的。

第一，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最强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要钢筋、水泥，中国这方面的产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建高速公路时期，那时候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非常强，但现在已经衰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快，培养了世界规模最大、非常有竞争力且效率非常高的施工队伍。在国际竞标中，中国施工队的成本在其他国家施工队的一半以下，甚至1/3。

第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资金，中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这些外汇储备过去用来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或是股票，如今美国政府的债券回报率非常低，如果去除掉通货膨胀是负利率。美国股票市场泡沫也很大，风险很高。如果中国拿出这3万亿美元储备当中的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只要这些项目选择好，回报率会相当高。展望未来，我国的经常账户每年还会有几千万美元的盈余。因而在资金投入上，中国具有优势。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以后是不是能致富，取决于有没有产业发展。前面谈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即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二战以后，日本发展起来是抓住了美国由于工资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失掉比较优势的窗口机遇期，日本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到1960年代工资也上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降低，当时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制造业，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抓住了当时

亚洲“四小龙”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中国也发展起来了。现在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快将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需要向海外转移。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就有可能像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一样快速发展起来。但这一次跟前面几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有很大不同，那就是量上的不同。比如1960年代，日本开始向外转移，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930万。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韩国制造业雇佣人数是230万，中国台湾是150万，中国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而这一次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4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到8500万。从这个统计指标上来看，中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足以让“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中收入水平在中国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再加上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如果它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就有可能抓住劳动密集型转移的窗口机遇期。

第四，思路决定出路。二次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它们在政策上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指导。然而，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是否具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用在发展中国家难免有“南橘北枳”的局限。但是，中国的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相近，来自中国的经验、理论和思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动员资源、克服困难、抓住发展的机遇将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

过去40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贫穷不是命运，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摆脱贫穷，而实现繁荣的道路是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共同繁荣的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百花齐放春满园、共同富裕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实现。

【作者简介】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南南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新结构经济学。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N Yi-fu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from 1978-2018. At the daw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o share the theory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chieve a beautiful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word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e Belt and Road;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frastructure; national rejuvenation

(责任编辑：马莹)